

《格理弗遊記》在臺灣： 日治時期〈小人國記〉、〈大人國記〉的 譯寫、諷喻與政治想像

林以衡*

摘 要

18 世紀愛爾蘭文學家綏夫特 (Jonathan Swift) 所著的《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是一部家喻戶曉的文學作品，綏夫特化身為小說主角「格理弗」，因各種奇遇而到小人國、大人國、飛島國和慧駟國冒險的故事，由於廣被世界各種語言所翻譯，稱它為世界文學中的經典之作，實至名歸。

晚清時期的中國，是一個吸納西方知識、器物與文學的時代，《格理弗遊記》也被亞洲的中國文人們所注意、翻譯。但《格理弗遊記》的影響，並非僅限於門戶漸開放的中國，1895 年日本領有臺灣後，臺灣文學在異國文化、政治的相互交織，以及傳統與現代不斷地磨合下，逐漸建立起屬於自我的獨特風貌，翻閱日治時期臺灣的報紙，抑或是臺灣傳統知識份子所寫的詩、文、小說，不難發現受到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其文化特色是多元繽紛，內容更是豐富有趣，表現出臺灣對於外界知識的好奇與吸收，以及欲成為世界一環的積極心。

透過本文對「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在臺譯文的探討，將可發現譯者如何翻譯／改寫出一個符合臺灣閱讀者習性的西方小說。而無論是「小人」或是「大人」登上臺灣後，絕非僅是供以娛樂的遊記，而是其背後更帶有如上所述、身處殖民語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龍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境下濃厚的諷寓、啓蒙寓義。是故，這兩篇小說被譯寫到臺灣時所產生的各項問題，將是研究日治時期臺灣通俗小說時，不可忽視的問題面向。

關鍵詞：格理弗遊記、大人國記、小人國記、殖民臺灣、翻譯文學

***Gulliver's Travels* in Taiwan: the Translation, Satir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of “Lilliput” and “Brobdingnag” in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Lin Yi-Heng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djunct Instruct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novel *Gulliver's Travels* written by Irish writer Jonathan Swift in 18th century is a household literature. With a first-person narrative, Lemuel Gulliver's adventures in Lilliput, Brobdingnag, Laputa and Houyhnhnms reflect Jonathan Swift's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s. Since this masterpiece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any languages, it is definitely the classic of World literatur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China, it was the time when western knowledge, implements, and literature were highly and intensively introduced into the eastern world. *Gulliver's Travels* also drew Chinese literati's attention and was translated then. This novel didn't just make a great impact on China with an open door policy at that time. After Japan occupied Taiwan in 1895, with the intertexture of exotic cultures, politics, traditions and modernity, Taiwan culture has gradually built up its own style and features. Through browsing through newspapers in Taiwan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or reading poems, articles, novels written by Taiwan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we can find the diversity in Taiwan culture. What's more, the contents were substantial and interesting enough to show the Taiwan intellectuals' curiosity and absorbency toward external

knowledge and eagerness of being part of the world.

The article aims at discussing the Taiwan version of translations of “Lilliput” and “Brobdingnag”. We would discover how the western novel was translated or adapted to conform to Taiwan people’s tastes for reading. Either “Lilliput” or “Brobdingnag” was not merely the travel for entertaining readers as it was brought into Taiwan. It was the satire, enlightening meaning lying behind these travels that counted in the surroundings of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us, the problems generated by Taiwan version of translations will be unavoidable once we start to study Taiwan popular novels in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Keywords: Gulliver’s Travels, Brobdingnag, Lilliput, Colonial Taiwan,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格理弗遊記》在臺灣： 日治時期〈小人國記〉、〈大人國記〉的 譯寫、諷喻與政治想像*

林以衡

一、前言

近年來，在眾多研究者的努力下，臺灣文學作為世界文學的一環，已逐漸為人所肯定。但也反映出臺灣文學若要持續建立起自己獨有的特色，就必須不停吸納世界各地的文化，如此臺灣文學的價值，才能更為人所重視。那麼，哪一種文學作品最能表現出臺灣與世界接軌的特點呢？具有通俗性質、易為大眾所接受的小說，即是代表臺灣迎向世界，並展現臺灣多元文化特點的文類。只要一翻開日治時期的各式報紙，不難發現報紙上刊載了許多諸如武俠、歷史、言情和偵探類型的小說，而透過翻譯手法引介進入臺灣的西洋翻譯小說，更成為臺灣閱讀者想像西方、拓展見聞以及娛樂教化的文化媒介。由黃美娥的研究中，可知早在日治初期的臺灣，就已透過小說的書寫，想像一個東方人眼中的西方世界，並透過小說內容介紹，達到對臺灣閱讀者傳播知識、啟蒙教化的目的。¹在此知識建構的文化背景下，許多具有濃厚「現代性」色彩的西洋小說，就這樣透過「譯寫」的方式，在不違背臺灣閱讀者的習性下，帶給臺灣的小說閱讀者一次次全新的閱讀感受。例如以「異史」為筆

* 拙文初稿曾宣讀於「第九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2010年7月9-10日），會中承蒙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江寶釵教授之講評，初步修改後，又蒙二位匿名審查人提出不少精闢見解供拙文修改，獲益良多，在此致上誠摯的謝意。

¹ 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通俗小說中的文化地景、敘事倫理與知識想像〉，《臺灣文學研究集刊》5（2009），頁1-39。

名者所譯寫的〈羅馬王國〉，藉由小說的書寫為臺灣讀者介紹古代西洋歷史外，同時抒發作者自身對於歷史變動的感慨。其他經由翻譯手法為臺灣所接受的小說像是〈俠盜羅賓漢〉、〈小人國記〉、〈大人國記〉等²，皆成就日治時期臺灣翻譯小說的繁盛面貌。其中，18世紀蘇格蘭文學家綏夫特（Jonathan Swift）所著、風靡全球的文學著作《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³，在綏夫特化身小說主角格理弗後，因各種天災奇遇先後到達小人國、大人國、諸島國和慧駟國等地冒險，過程精采且發人省思，受到讀者的喜愛。於是《格理弗遊記》廣被世界各種國家的語言所翻譯，稱它為世界文學中的經典之作，實至名歸。⁴而屬於本書前兩章的〈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被譯寫進入臺灣，其中所富含的歷險情節、地理刻畫不但擴大日治時期臺灣閱讀者對西方世界的想像，同時，〈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對人性的批判、諷諭，也一起被譯寫進入臺灣，為臺灣閱讀者所閱讀。⁵

曾幾何時，原本應是充滿人性寓意的〈小人國記〉和〈大人國記〉，竟隨著時間的變化成為當代童書架上的暢銷書籍，在經典之作童書化的過程中，此文類性質的轉變，無形中抹殺作者綏夫特藉由小說創作指桑罵槐的苦心。幸運的是，日治時期在《臺灣日日新報》上刊載的這兩篇小說，並未被此時的翻譯者和報紙編輯以兒童文類視之，表現出日治時期譯者、讀者或是報紙編輯，對於文學諷喻性有深刻的理解。時至今日，單德興以嚴謹的學術研究方式對《格理弗遊記》的翻譯，以及一連串由此引申而出對《格理弗遊記》中文譯本的研究、翻譯理論的闡述等，將是本

² 〈俠盜羅賓漢〉，《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13年（1924）4月16日。〈小人國記〉，《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5年（1930）3月3日至5月18日。〈大人國記〉，《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5年7月6日至12月6日。

³ 《格理弗遊記》的作者綏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是一位愛爾蘭籍的知識份子。他熱衷時政，處處以愛爾蘭的前途為己身最大的努力目標。他不滿英國時常干涉愛爾蘭的經濟與政治，所以常著文批評時政，以喚起愛爾蘭民眾的共鳴。有名的如《布商書簡》，影響政策甚鉅。在英國時常干涉愛爾蘭內政的風氣下，作者本身介於惠格黨與托利黨政爭的關鍵角色，更是影響他完成《格理弗遊記》的重要原因。所以，這部書不但是融歷險、奇幻、遊記於一身的諷刺小說，更可讓人從中了解西方政治的複雜度，足以作為殖民地臺灣知識份子和民眾深思的範例。以上背景參考單德興譯注：《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頁34-51

⁴ 單德興教授為我們簡介了各種譯本，在之後對《格理弗遊記》的分析中，雖有提到它與日本的關係，但未將日文譯本列入介紹。同前註，頁83-87。

⁵ 本文對於書名和作者的譯名，採用單德興教授的譯注。若有須引用到今本之處，亦採用單氏的譯注。

文欲處理日治時期的〈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各項問題時重要的參考資料。⁶但由於過去臺灣文學長久以來的被壓抑，或是各項史料未被發掘，〈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在日治臺灣的譯寫來源、特色以及置於殖民語境下所產生的寓意，並沒有被列入單氏的研究中，甚為可惜。因此，當本文欲以日治時期在臺灣報紙上刊登的〈小人國記〉和〈大人國記〉為析論對象時，就必須逐步釐清，日治臺灣如何對「小人」與「大人」的角色進行想像與體驗，才能了解〈小人國記〉和〈大人國記〉為何能迎合閱讀大眾的興趣並譯寫進入臺灣。以及日治臺灣的〈小人國記〉和〈大人國記〉與《格理弗遊記》在東亞翻譯史上有何關聯，此兩篇小說是否經由日本或中國的譯本而來，乃至於在殖民語境下，它如何經由譯介發揮其諷喻上的作用，以達到臺灣譯者對它的翻譯，並非只是文字上的形式翻譯，而是能將小說要表現的「譯意」傳達給臺灣讀者理解。最後，則將探究，譯者如何藉由此兩篇小說的翻譯，傳達一個既虛且實的國家想像給臺灣讀者閱讀，甚至由此擴大對整體人性的思考？經由對以上諸問題的探討，不但可證明日治臺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接軌，更可闡明經由譯寫進入臺灣的小說，在殖民體制下產生何種作用，通俗小說在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的研究價值，也將隨之提升。

二、日治時期臺灣人對「小人」與「大人」的想像

人類對於異於自己的人、事、物，總是充滿著好奇與想像，對於異於平常人體型大小的「小人」與「大人」也是如此。在中國，許多古代典籍上都載有對小人世界與大人世界的描繪，例如《山海經·海外東經》說：「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者……，

⁶ 單德興：〈譯者的角色〉，《國科會外文學門 86-90 年度研究成果論文集》（臺中：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2005），頁 1-28、〈翻譯・經典・文學——以 Gulliver's Travels 為例〉，馮品佳主編：《通識人文十一講》（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頁 79-112。以及〈格理弗中土遊記——淺談《格理弗》最早的三個中譯本〉，彭鏡禧主編：《解讀西洋經典：小說、思想、人生》（臺北：聯經出版社，2002），頁 21-45。

大人國在其北，爲人大，坐而削船。」⁷《大荒東經》則紀載的更爲詳細，指出除了有「大人國」外，也有「小人國」的存在：「有波谷者，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踐其上，張其兩耳。有小人國，名靖人。」⁸而晉人張華所著的《博物志》，則把「大人」與「小人」的長度，以及所具有的特點，紀載得更爲清楚：

河圖玉板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大秦國人長十丈，中秦國人長一丈，臨洮人長三丈五尺……。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國僬僥氏，長三丈……。日東北極人長九寸。」⁹

由此可知，古代中國所理解的「大人」，最高可以高達三十丈，而「小人」最小，則只有九寸，「大人」與「小人」間，差距甚遠。而「大人」的壽命，又比平常人類還要來得久。

這些古籍中對「大人」、「小人」的記載與描繪，隨著時間推移，在小說家的渲染下，不但內容增加，描述的情節亦更爲生動。清代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即有不少以「小」爲主題的短篇故事，例如〈小獵犬〉中說：「忽一小武士，首插雉尾，身高二寸許；騎馬大如蜡；臂上青鞵，有鷹如蠅；自外而入，盤旋室中，行且駛。」¹⁰〈小人〉也言：「康熙間，有術人攜一榼，榼中藏小人，長尺許。」¹¹而往往被中國學者拿來與西方的《格理弗遊記》相提並論、由清代文人李汝珍所著的小說《鏡花緣》，作者亦藉由小說的書寫，將《山海經》中的「大人」與「小人」描寫爲海外探險的一部份，《鏡花緣》中的「大人」與「小人」，不僅只有體態特徵的描繪，更多了對人性刻畫的描寫，例如說「大人國」：「蓋因國人皆以黑雲爲恥，遇見惡事，都是藏身退後，遇見善事，莫不踴躍爭先，毫無小人習氣，因而鄰邦都以『大人國』呼之。」¹²「小人國」則被評爲：「此地風俗礪薄，人最寡情，所說

⁷ 袁珂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1），頁234。

⁸ 同前註，頁341-342。

⁹ 晉·張華：《博物志》（臺北：藝文印書館，1958），頁31。

¹⁰ 清·蒲松齡著：《聊齋誌異》（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3），頁337。

¹¹ 同前註，頁384。

¹² 清·李汝珍：《鏡花緣》（臺北：聯經出版社，1997），頁81。

之話，處處與人相反。」¹³由最初對「大人」、「小人」只能概略地說在何方、進而言及較為清楚的體態，最後更以「大人」與「小人」為例，刻畫人性的善與惡，中國文學中一系列對於「大人」與「小人」的書寫，見證不同時代的人對異世界、異形體之人的好奇與好像。那麼，時間若推移到近代日治時期的臺灣，時下之人，如何想像「大人」或「小人」？他們眼中的「大人」與「小人」，又是呈現何種形貌？

日治時期臺灣以漢文標寫「小人」或「大人」時所指稱的對象，並非只有在體型上特殊的群體¹⁴，但若是針對體型上與常人差距甚遠而產生對「小人」與「大人」的想像，則大多與古代中國一樣，源自於對廣闊世界的好奇。不同的是古代中國是以自我為中心，以方位指稱何處有大人、小人。隨著時代的變遷，此時的臺灣，則已具有世界各大洲的地理概念，故在認識大人與小人時，能以精確的地名，說明大人與小人的活動地點，大正 15 年（1926）的《臺灣日日新報》，就刊載了這樣一則消息：

據英國漢外聖書會秘書威理幕竊母氏言，彼近由亞非利加游歷而歸。曾於該洲中部，見有身高七尺之大人種，其人口約有二百餘萬，性喜運動，若能利用其體力與身長，使之運動競技，必可在世界運動界中，開一新紀元。最奇者，該洲西北地方，又有身高四尺之小人種。大小二種，適相對照，可謂奇也云云。¹⁵

這裡所指的「大人」與「小人」，居住在非洲，有趣的是，文章中還認為，此「大人」因為有體格上的優勢，所以極具運動能力，可參加世界運動比賽，不再是小說中對大人「長壽」或是「腳踏祥雲」的抽象性描寫。文章中並提及，既然有「大人」的出現，西北地方則有相對性的「小人」存在。這種性質屬於「世界異聞」的消息，

¹³ 同前註，頁 122。

¹⁴ 日治時期以漢文標示的「小人」，可能指稱的是品德不佳者，例如〈小人難養〉一文中，對在鹽局中被罷黜的職員稱「噫，如二人者可謂小人難養者矣。」〈小人難養〉，《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明治 33 年（1900）7 月 25 日。而以日文詞彙觀之，「小人」一詞日語以平假名寫為「こびと」，則可以解釋為小孩、或是童話中之小人的雙重意義。故漢文之「小人國」，日文則寫為「こびとの国」。而「大人」一詞則相對簡單，可能指稱的是對政府官員的尊稱語，或是對警察的稱呼。

¹⁵ 〈摭談〉，《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大正 15 年 6 月 29 日。

主要就是為臺灣讀者傳達一個「奇」的想像空間，但也由此消息可觀察，此時期的臺灣，透過報紙對外電消息的接收、媒體的傳播力量和記者的翻譯能力，對廣闊世界所包含各式各樣的奇人異事，都充滿高度好奇心。

由於「小人」與「大人」在體型上異於常人的特點，日治時期的臺灣，仍有出現如《聊齋》般，將「小人」的描繪，以帶有神祕性色彩出現的文章。昭和7年（1932）的〈由須彌山飛出的小人〉¹⁶，是屬於「山村的怪談」類的文章，內容描述日本東北的山間鄉下，一百姓的養子友治去世後，於頭七之日化身為小人，由和尚唸經的須彌壇下跑出。文章作者「S.S 生」以第一人稱的敘事手法，表示自己聽到這個消息後，親自前往見證，也見到此小人的出現，雖名為「怪談」，作者卻嘗試以自己現身說法的經歷，來增加臺灣閱讀者對此事的可信度，也可見雖然昭和年間的臺灣現代化已近完備，但類似此將「小人」描繪成帶有神怪性色彩的文字，除可供娛樂外，也開拓臺灣閱讀者另一個對「小人」的想像空間。

無論是海外異聞的報導，或是神怪性的文字，在經由轉譯、改寫的添加下，由於臺灣民眾未能對「小人」或「大人」眼見為憑，導致兩者在臺灣民眾心中的形象，只能是天馬行空的想像，而未能有親眼目睹的感受。但這股何謂「大人」或「小人」的遺憾，隨著國外劇團來到臺灣演出，得以彌補。昭和元年（1926），《臺灣日日新報》上，刊載了一則「露西亞歌劇團」來臺演出的消息¹⁷，此團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即是以「小人」為號召，期能在歌劇表演外，藉由型體的特異，吸引臺灣民眾前往觀賞表演，為展示其特色，在副標即以「最大二十九歲三尺二寸（女優）。最小三十八歲二尺八寸（男優）」的文字說明，將男女演員的年紀和身高標示出，內文中除介紹此團由日本札幌劇場表演完後，搭乘蓬萊丸到達臺灣，記者再次強調男女演員的身高特點，甚至以《格理弗遊記》中的「小人島」為例，兩者相提並論：

女優三人和男優三人，都是非常地小，男優的「ソコレツキ」三十八歲二尺

¹⁶ S.S 生：〈或る山村の怪談 須彌壇から小人が飛び出した〉，《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昭和7年8月31日。

¹⁷ 佚名：〈小人 六人から成る 露西亞歌劇團が避寒興行に來臺〉，《臺灣日日新報》，第8版，昭和元年12月28日。

八寸，女優的「マルヒヨノワ」二十九歲三尺二寸。可以與「格理弗遊記」（かりバリーの漂流記）中的小人島聯想在一起。¹⁸

記者爲了宣傳「露西亞歌劇團」來到臺灣的消息，不但在男女演員特異的體型上，標以明確的數字，以讓時人了解其「高」外，引用「格理弗遊記」作爲比擬的對象，更可證明「格理弗遊記」的內容，已被此記者所知，故拿來作爲形容、類比的範本。由此可以說明，昭和5年（1930）時會有〈小人國記〉、〈大人國記〉接連刊登在《臺灣日日新報》上，在此之前自昭和元年起，一系列介紹「大小人國團」、「小人國團」來到臺灣表演的報導文章¹⁹，已奠定臺灣閱讀者對「小人」、「大人」真實形象的基本概念，揭開臺灣閱讀者欲對「小人」、「大人」有更多認識的興趣。當兩篇小說以漢文譯寫的方式刊載於報紙上，在以過去對「小人」、「大人」的介紹、怪談和宣傳爲基礎下，〈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很容易地進入臺灣文學的領域中，並爲臺灣民眾所接受和閱讀。對譯者而言，則是看準當時一股「小人熱」和「大人熱」的風潮，所以將其翻譯進入臺灣。但日治臺灣的〈小人國記〉、〈大人國記〉既然是翻譯外國文學作品而來的，就值得進一步追問，譯者翻譯時所依據的版本，源自何方？

三、「小人」、「大人」來臺灣： 日治臺灣版「大小人國記」與中、日譯本的差異

論及日治時期臺灣小說由西方小說譯介而來的問題，首先必須確定小說譯介時所根據的原本爲何，才能理解日治時期的臺灣，如何藉由文學譯介的行爲，展開對世界文學的認識。若以《格理弗遊記》爲例，探討日治臺灣對此著作的翻譯底本所

¹⁸ 同前註，原文爲日文，筆者自譯。

¹⁹ 除了昭和元年的演出介紹外，昭和2年（1927）1月22日有〈小人島藝術團〉、2月27日有〈臺中の小人國團〉的表演介紹，與昭和元年皆爲同一團體，在臺灣巡迴演出。但相關新聞的介紹並未隨著此團體長時間在臺灣而消退，仍可見臺灣民眾對其體型以及表演上的注意。

據為何，就必須考慮臺灣文學在殖民時期可能受到的各種文化影響，於是日治臺灣的〈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到底是由中國最初以中文譯成的《格理弗遊記》為底本，還是由日本的“かりバリーの漂流記”而來，甚至是譯者直接以英文原版為依據，直接譯寫進入臺灣，這三個思考面向，就成為欲考察日治臺灣〈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翻譯來源的首要問題。²⁰

（一）與中文譯本的比對及轉譯的可能性

早在〈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以漢文刊載於昭和 5 年（1930）的《臺灣日日新報》前，《格理弗遊記》就已出現過三個中文譯本，分別是清同治 11 年（1872）在《申報》上連載的《談瀛小錄》、光緒 29 年（1903）在《繡像小說》上刊行的《汗漫遊》（又名《焦僥國》），以及光緒 32 年（1906）、由林紓翻譯的《海外軒渠錄》。²¹單德興的研究已指出，這三個中文譯本各有其特點，但《談瀛小錄》只連載了四天²²，雖有開創性的價值，卻難窺全貌，且譯者改寫的意圖明顯，與日治臺灣的「大小人國記」差異甚大，故不可能由《談瀛小錄》轉抄而來。至於其他兩本中文譯本，《汗漫遊》將整本《格理弗遊記》的四個部份全都譯出，林紓的《海外軒渠錄》分上、下卷，如同日治臺灣的版本一樣，只將「大小人國記」的部份譯出。無論這三個中文譯本有沒有將全本《格理弗遊記》譯出，〈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都是這三本中文譯本都有翻譯到的共同部份。

那麼，日治臺灣的「大小人國記」在翻譯時，有沒有受到前面二個中文譯本的影響，或是直接將過去的中文譯本冒名頂替、刊載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畢竟日治時期的臺灣報紙上，並非沒有出現以匿名方式刊登中國小說的例子²³，且就時間

²⁰ 本文受限篇幅與能力，無法如同單德興教授般，將林紓所譯的《海外軒渠錄》與原本《格理弗遊記》作逐字逐句的更正與比較。本文的探討重點在於，到底日治時期的「大小人國遊記」翻譯依據的來源為何。

²¹ 同註 3，頁 88-116。林紓、魏易譯：《海外軒渠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李伯元主編：《繡像小說（第 3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²² 同註 3，頁 91。

²³ 例如，昭和年間出刊的《三六九小報》上，就曾轉刊過不少錢基博所著的《技擊餘聞補》（臺北：廣文，1983）。後期的《南方》雜誌上，有湖邊客：〈三鳳爭巢〉（一～二十五）：《南方》，昭和 17

的先後觀察，中國早在同治年間就已經初步認識了《格理弗遊記》，而臺灣則整整晚了半世紀多，才將〈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介紹給臺灣讀者閱讀。那麼，前面的三個中譯本是否有影響到日治臺灣的「大小人國記」呢？只要閱讀過日治臺灣的這兩篇小說，並對照之前的三個中文譯本後，即可知臺灣的譯本並非直接將過去的三個中文譯本複製過來，不但翻譯的內容有若干差異，所依據的版本也不同。

首先，就翻譯的內容而言，吳錫德認為：「『譯文的文化表現』便成了翻譯過程中至關緊要且不容忽略的一環。」²⁴劉宓慶更指出要有準確的文化意義、良好的讀者接受及適應的審美判斷，才能是一種「文化適應性」（cultural compatibility）。²⁵那麼，日治時期的「大小人國記」，如何發展出一套不同於其他三個中譯本的「譯文文化表現」，或是屬於臺灣自身的「文化適應性」呢？

由小說之初加以觀察。小說一開始介紹主角格理弗的生平，日治時期的〈小人國記〉刪去對格理弗生平的詳細介紹，只簡單略述了他的出生地、家世和求學過程，以及為何出海航行的經過，格理弗娶妻，或是「長於記憶，所以很有語言才華」的重要特徵則略而不提，比之林紓有將此段作者特徵譯出，日治時期的〈小人國記〉顯然對於原作者所安排的伏筆、顯示格理弗到大、小人國後很快能與當地人溝通的用意並不了解。在〈小人國記〉中，今本、林紓本以及《汗漫遊》都有對格理弗與小人國官員妻子的緋聞作描述，但日治臺灣的〈小人國記〉則省略此情節。而小說主角格理弗便溺一事，日治臺灣只要譯到小說主角欲排泄的情節時，往往以「我便要小解」、「我尿多」、「兩天沒有解手」等直接語句翻譯而出，《汗漫遊》則用「小解」、「出恭」等語句代替，且篇幅甚少，對於汗穢情節頗有匆忙帶過之感。《海外軒渠錄》遇到這些情節時，以「余得側身便旋矣！其溺汪洋，眾復大駭，不知其所以然。」²⁶的桐城古文的語句，而顯得較為隱晦。最後，就語言使用而言，

年（1942）6月15日第154期～18年（1943）8月1、15日第181-1期。實為臺灣作家將中國作家姚民哀的作品以匿名方式轉載過來。

²⁴ 吳錫德：〈翻譯過程中「文化元素」之轉化〉，收錄於《世界文學：翻譯文學&文學翻譯》（臺北：麥田書局，2002），頁99。

²⁵ 劉宓慶：《文化翻譯論綱》（武漢：湖北教育，1999），頁73。

²⁶ 同註21，頁7。

林紓為桐城派大儒，因此《海外軒渠錄》通篇使用文言文的句法譯寫，《談瀛小錄》與《汗漫遊》的文體則為文白夾雜，但最晚出現的日治臺灣「大小人國記」則已經是用白話文的手法翻譯而出。除了某些字詞因譯者不同而有所差異，或是部份情節被刪去外，整體閱讀後，日治臺灣的「大小人國記」和當今的中譯本相比，較為接近。此點不但顯示臺灣到了昭和年間，翻譯程度已進入成熟階段，譯者運用中文白話文表現在報紙上的小說中也極為熟練。若由格理弗遊記的中文翻譯過程而論，日治臺灣的「大小人國記」，時間點上晚於之前的三個中譯本，而語法較近於當今的譯本，故日治臺灣的「大小人國記」實是成為承接過去 50 年的三本中文譯本與當今譯本的一個重要橋樑。

再者，以翻譯時所依據的版本而言，日治臺灣的「大小人國記」與林紓的《海外軒渠錄》所依據的原著本不同。例如，《海外軒渠錄》第三節，講述小人國皇帝獎賞表演有功的臣下時：

皇帝出錦線三，長可六寸，實之几一紫、一黃、一白，此綫為獎賞上烈者，技在宮掖中奏之。奏技之人較前為異……。上下中程者，則錫與紫色之綫，其次則黃，又次則白，眾得綫即重圍其腰，而王公大臣中，咸有此線綫以示寵也。²⁷

在此林紓是以「紫、黃、白」三線來表示小人國皇帝對表演者的獎賞，但日治臺灣的〈小人國記〉，與《海外軒渠錄》不同：

在桌子上，一根是藍的，一根是紅的，第三根是綠的。這些線，是皇上預備賞給恩寵的特別記號獎品。儀式是在金殿舉行在那裡候補的人……。跳得最長久便賜給誰藍色絲線。紅色的，給第二名。綠色的給第三名。²⁸

會出現「紫黃白」和「藍紅綠」的差別，主要就是翻譯時所根據的原著版本不同，單德興指出《海外軒渠錄》的「紫黃白」，是因為小說初版時為避免太過直接的影射當下政治人物，出版商自行的修改，所以應是以 1726 年後及其衍生版本為底本。日治臺灣的「藍紅綠」則是《格理弗遊記》最初的寫法，9 年後又被改回原來的「藍

²⁷ 同註 21，頁 20。

²⁸ 同註 21，頁 19。

紅綠」。²⁹至於《談瀛小錄》與《汗漫遊》由於未將此段譯出，所以不知所根據的版本為何。不過由此點可知，日治臺灣的「大小人國記」與林紓的《海外軒渠錄》，由於翻譯時所依據的版本不同，再加上行文、用語互異，日治臺灣的「大小人國記」和過去三個中文譯本，沒有直接的關係。³⁰

在外在環境與所處時代的影響下，「大小人國記」每個時期的中譯本，皆有其不同的特點。但由譯寫的語法、內容的增刪等層面觀察，可知日治臺灣的「大小人國記」，並非直接轉載《汗漫遊》或是《海外軒渠錄》而來，由於小說並未署名譯者，無從考察其生平經歷和閱讀經驗，是否在翻譯「大小人國記」時有參考過之前的中譯本，無法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經由翻譯內容的比較後，日治時期的「大小人國記」並非全由早期的三個中文譯本直接抄寫過來，而較趨近於譯者經由外國語言直接翻譯而來的作品。

（二）與日文譯本的比對及轉譯的可能性

既然日治臺灣的「大小人國記」並非由套用、改寫過去的三個中文譯本而來，那麼它翻譯的依據，就會是由國外語言書寫的小說譯寫而來。論及日治時期的翻譯問題，直接由外國語言翻譯成漢文固然是一個翻譯的途徑，但不能忽視的是，作為日本的殖民地，也會存在著翻譯作品是先被翻譯成日文後，再由日本傳入臺灣，並被譯者翻譯為漢文的現象。早在日治初期，就有不少小說是經由日文翻譯成漢文後，刊載在報紙上供讀者閱讀，因此追查《格理弗遊記》在日治臺灣的譯寫來源，就必須將日本對《格理弗遊記》的翻譯情形納入討論，並與日治臺灣的版本加以比對其異同之處，如此才能確認日治臺灣「大小人國記」的翻譯依據，來自何方。

《格理弗遊記》在日本的最早譯本，是明治 13 年（1880）出版，由片山平三郎口譯、九歧晰筆記的《繪本鵞鵲蟠兒回島記》³¹。《鵞鵲蟠兒回島記》開頭有署名「一六居士」以漢文書寫的卷頭文字，指此書有「開卷驚人事，總奇寓言一」的功

²⁹ 同註 3，頁 56。

³⁰ 《汗漫遊》內容中並未提及此情節，故無從得知其翻譯根據的版本。

³¹ 片山平三郎口譯、九歧晰筆記：《繪本鵞鵲蟠兒回島記》（東京：薔薇樓藏梓，明治 13 年 3 月 23 日）。

效，並讚此書是「大小千里游，神通筆（筆）一枝」的特點。可見此書初次被翻譯入日本時，其極富想像的遊記內容，帶給日本讀者驚奇的感受。而在進入內容之前，譯者也以極大的篇幅，介紹作者綏夫特的生平經歷，並附有「凡例」，跟讀者說明本書翻譯的方式、如何表記等問題，特別是在「凡例」中說明為何以漢字「鰐蟠兒」作為書名，就此書而言「鰐蟠兒」的假名是「がりばる」，與「ガリバル」之譯名，差別只在於假名書寫的不同。按理而言，《格理弗遊記》為由國外翻譯至日本的著作，以片假名來標示書名，亦不為過。但譯者在此故意以漢字和平假名示之，是因為以日本民眾較常使用和熟悉的平假名和漢字作為書名的翻譯，可以減少翻譯所帶來原著與閱讀者之間的隔閡，且由於在「凡例」中指綏夫特是著此書為「戲作」，以漢字僻字來表示，也能收到引人注意的娛樂效果。但若將此書閱讀完即知，現存《鰐蟠兒回島記》其實只有把首編「小人國」共八章譯畢，不但全書未譯完，連與「小人國」相提並論的「大人國」也未提及，故內容十分精簡短少。³²而就翻譯的手法而言，譯者不以第一人稱「我」自稱，或是在文中大量使用「ガリバル」之名，而是以漢字「記者」作為小說主角的自稱，翻譯手法十分奇特，因為就原著來說，小說主角「格理弗」的角色為船醫或是水手的身份，並未具有「記者」的身份，但小說的作者綏夫特氏，其生平卻有擔任過「報紙編輯」的職務，因此，日本譯者在此直接將小說主角以「記者」來表示，除了是因內容趨近於奇聞異事的介紹外，也在此直接將虛構世界的「格理弗」等同於現實生活中的「綏夫特」，認為「格理弗」即是「綏夫特」的化身，此法極為特別，在中文譯本中皆未見。

由以上《鰐蟠兒回島記》的翻譯可知，此日文本與日治時期的〈小人國記〉，差異極大，單就形式而言，〈小人國記〉以第一人稱「我」的敘寫手法，就與《鰐蟠兒回島記》以「記者」之名有所不同。就內容而言，《鰐蟠兒回島記》將所有小說主角便溺的情節全部刪去，而日治臺灣的版本卻又將其清楚譯出，故《鰐蟠兒回島記》在時間點上雖早於日治臺灣的〈小人國記〉，卻不是〈小人國記〉翻譯時所依據的版本。

³² 因為如此，九歧晰有另一本名為《小人世界》的書籍問世，本文暫無法見此書的全貌，但應是由《鰐蟠兒回島記》中改寫或分開的內容。九歧晰：《小人世界》（出版地不詳，明治20年（1887）8月）。

《鵞鵲蟠兒回島記》出版後，相隔 29 年的明治 42 年（1909），松元至文、小林梧桐兩人也共譯了一本《ガリアー旅行記》³³，此書不但有譯者的序言，同時，仍有對作者綏夫特氏的生平介紹。和前一本《鵞鵲蟠兒回島記》相比，除了因譯者不同，所造成內容和文字上的差異外，最大的不同，就是《ガリアー旅行記》將全本《格理弗遊記》四編全都譯出，不再只著重「小人國」或「大人國」的部份。此書以第一人稱「私」的手法譯出，與綏夫特氏著此書時使用第一人稱的手法相同。不過，與《鵞鵲蟠兒回島記》一樣，內容中有關於便溺的部份也被刪除，故非日治臺灣所依據的版本。隔年（明治 43 年），由菅野德助、奈倉次郎共譯的《ガリウアー小人國旅行》緊接出版³⁴，但此書的目的是當作英文教材，且刪去的內容頗多，自也不是日治臺灣詳細譯寫下所能依據的版本，不過，因為是作為英文教材，該書以段為單位，採和英對照並加以註解的方式，成為此書不同於前兩部譯本的最大特點。

此後，一直到大正 10 年（1921），才又出現平田禿木譯、岡本歸一繪的《グリバア旅行記》³⁵，此書在「序言」時，是以譯者自身到英國遊玩，在英國首都倫敦見到倫敦塔、畫館、博物館等遊歷經驗作為開頭，然後才提到《グリバア旅行記》的誕生，本書並未遺漏對於作者的生平簡介，也將整本《格理弗遊記》全部譯出，最大的特點在於插畫數目遠比前兩本譯本都還要多，但也把主角便溺的情節皆刪去。大正 13 年（1924）由仲側紅果譯的《ガリバア旅行記》則直接被歸類到日本兒童文庫，在性質上就已經與各本相去甚遠了。

以這幾本本文目前所見，皆早於昭和 5 年的《格理弗遊記》為例，與日治臺灣的版本進行比對後，確認日治臺灣的版本並非經由這些日本譯本「二度翻譯」後，才來到臺灣。由上述的各點差異，可見日治臺灣的「大小人國記」非由日本而來。日治臺灣的「大小人國記」唯一與上述各本相同的地方，即是對有功者所授予綵帶

³³ 松元至文、小林梧桐譯：《ガリバア旅行記》（東京：昭倫社，明治 42 年 1 月）。

³⁴ 菅野德助、奈倉次郎譯：《ガリウアー小人國旅行》（東京：三省堂，明治 43 年）。

³⁵ 平田禿木譯：《ガリバア旅行記》（東京：富山房，大正 10 年）。

顏色「藍紅綠」的象徵³⁶，而日本譯本不約而同地將小說主角便溺的情節刪去，或許是認為此一情節不登大雅之堂所作的更動。但藉由此點，可發現日本各譯本間存有相互影響的情況，卻又能在「格理弗」的譯寫風潮下，各版本仍保留其獨具的翻譯特點，值得日後再進行更深入的比較。

所以，日治時期臺灣版的「大小人國記」，不是由中國的三本中文譯本傳抄而來，更非是由日本明治、大正時期譯寫的《格理弗遊記》轉譯而來，且經由對綵帶顏色「藍紅綠」共同點的探究，可知日治時期臺灣版的「大小人國記」，是譯者直接由西方著作譯寫過來的可能性為大。《格理弗遊記》中的〈小人國記〉或〈大人國記〉就這樣由西方世界直接進入臺灣，而不是經由中國、日本的二度譯寫後，才為臺灣讀者所閱讀，此可見證日治時期的臺灣通俗小說，在翻譯能力方面，已具備與西方文學直接接軌的能力。

四、「大小人國記」在日治臺灣的諷喻作用

在世界各地擁有多種譯本的《格理弗遊記》，雖然在當下往往被大眾改寫、誤認為兒童讀物，但仍有很多譯者在翻譯《格理弗遊記》時，並未誤解綵夫特氏在撰寫各篇小說時所苦心經營的諷喻意義。林紓在《海外軒渠錄》的「序言」中就說：

嗟夫！葛利佛其殆有激而言乎？葛著書時，敘記年月為一千七百餘年。去今將二百年，當時英政不能如今美備，葛利佛佗僚孤憤，拓為奇想，以諷宗國。言小人者，刺執政也……。言大人則一味稱其渾樸，且述大人詆毀歐西語……，嗟夫！屈原之悲，甯獨葛氏。³⁷

林紓以中國諷喻文學的代表屈原比擬小說主角「格理弗」，認為兩人同樣對時政感到不滿，而欲藉文學作品諷諫時政，此諷喻作用於置於林紓所身處的晚清亂世，自

³⁶ 仲側紅果譯的《ガリバ旅行記》並未有提及綵帶顏色的內容。仲側紅果譯：《ガリバ旅行記》（大阪：日本出版社，大正13年（1924））。

³⁷ 同註21，頁2。

是期盼由《海外軒渠錄》的譯成，能教化中國讀者，以收喚醒民眾覺醒，並達成政治改革的功效，所以林紓能理解緩夫特的苦心。值得注意的是，林紓雖然因翻譯《巴黎茶花女遺事》一書後，在中國受到閱讀者廣大的迴響，並因此陸續翻譯了《黑奴籲天錄》、《迦茵小傳》、《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等書，甚至熱銷到持續再版³⁸，且同時代的梁啟超早已注意到政治小說的重要性，而在《清議報》上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一文，藉此肯定小說的通俗性、寓教化於娛樂的功用。³⁹但潘少瑜分析晚清文人們的翻譯心態時，則指出晚清知識份子在庚子事變後，其實對於中國的說部傳統多所指責，林紓對《封神榜》、《濟公傳》和《七俠五義》的攻擊尤為猛烈⁴⁰，雖說中國傳統說部文化並未因梁、林等人的攻擊而由晚清的社會中完全消失，但在家國秩序紊亂的大動蕩時代，若梁啟超、林紓等知識份子欲在發揚「新小說」時，兼顧中國傳統說部的精神，具有教化、啟蒙作用的諷喻傳統，就這樣成為他們刻意揚棄神怪、俠義類小說時的首選。在政治革新的風氣下，諷諭傳統成為晚清知識份子欲由舊文類中所萃取、且能夠在新小說中再度利用的精華。

日治時期的臺灣，除了諷喻傳統外，其多元的翻譯文化，並不會遜於晚清中國，除了本文所探討的「大小人國記」外，明顯由西方名著翻譯進入臺灣的小說如〈俠盜羅賓漢〉、〈丹麥太子〉等，皆為日治臺灣的翻譯文學增添許多色彩。例如〈俠盜羅賓漢〉以歐洲傳統綠林俠盜「羅賓漢」為例，翻譯其中一段財主搶婚、羅賓漢見義勇為的內容，對臺灣閱讀者而言，既是西方名著的介紹，又是可以和中國傳統俠義精神相聯結的讀物，中、西文化得以在臺灣融合。⁴¹〈丹麥太子〉則譯自莎士比亞的名作〈哈姆雷特〉⁴²，文末王子身死時所留遺言：「善事新王、勿替國體」

³⁸ 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頁122、187、199、226。

³⁹ 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梁啟超全集》第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172。

⁴⁰ 潘少瑜：《清末民初翻譯言情小說研究——以林紓與周瘦鵲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頁17。

⁴¹ 佚名：〈俠盜羅賓漢〉，《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大正13年（1924）4月16日。此篇故事譯自〈阿藍·亞·戴爾的故事〉（The Tale of Alan-a-Dale）。《羅賓漢》（The adventures of Robin Hood）（臺北：九儀，1998），頁101-105。

⁴² 觀潮：〈丹麥太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明治39年（1906）6月5日。

的「國體」用詞，隱然觸發日後臺灣研究者對殖民地臺灣產生「何謂國體」的思考。⁴³而從日文文本翻譯入臺灣的小說如〈寶藏院名鎗〉、〈塚原左門〉等，更是晚清翻譯文化中所缺乏的譯介來源，彰顯出日治時期臺灣受到日本殖民文化衝擊的特點。⁴⁴

當然，日治臺灣文化中，保留最多的，仍然是中國傳統的說部傳統，此傳統並未因政治分隔而斷絕，反而成為日治臺灣通俗小說重要的組成元素。昭和年間的「大小人國記」，除了有抵殖民上的諷喻意圖外，它也是在臺灣社會保有閱讀中國各類說部傳統的情況，以及受到晚清林紓、梁啟超翻譯小說的影響下，融合中國傳統說部與晚清新小說翻譯風潮所形成的。首先，就社會層面而論，大正、昭和年間日本殖民統治已趨穩固，臺灣並沒有像中國庚子事變般，遭受到列強的威逼，最後一個武裝抗日運動、發生在 1915 年大正年間的「西來庵事件」，雖是以宗教為號召進行起義，但也在短時間內遭到殖民者的鎮壓，所以對臺灣的知識份子而言，傳統說部中的怪力亂神，難以與宗教變亂相聯結，並不會出現如晚清文人般視言情、神怪和俠義小說為政治改良上的毒瘤現象。而 1920 年左右，張我軍、張梗等人與傳統文人展開的「新舊文學論戰」，論戰期間，張梗雖然批評臺灣社會對於中國舊小說的閱讀並不可取，認為舊小說當有所改革⁴⁵，但中國說部近口語且白話的文學形式，仍成為新、舊文人相互論辯時的折衷讀物，到底要完全放棄或是保留，在日治時期並未形成一個共識，而是雙方各取所需地進行議論⁴⁶，中國說部就這樣在殖民地臺灣文化的發展中，持續受到各類人物的歡迎。⁴⁷1930 年後，通俗刊物《三六九小報》

⁴³ 相關問題可參考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漢學研究》28:2（2010），頁 363-396。

⁴⁴ 魏清德：〈寶藏院名鎗〉，《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明治 44 年（1911）5 月 30 日。松林伯痴演、雲林生譯：〈塚門左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3 版，明治 44 年 1 月 23 日。

⁴⁵ 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臺灣民報》2:17，大正 13 年（1924）9 月 11 日-23 日。

⁴⁶ 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頁 8-9。

⁴⁷ 例如，昭和 17 年（1942），楊逵談他為什麼喜歡讀中國章回小說《水滸傳》，同年，西川滿在《國語新聞》上連載《西遊記》。楊逵：〈談《水滸傳》〉，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詩文卷」（下），（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頁 38-39。西川滿的部份可參考陳藻香：《臺灣時代的西川滿文學》，收於葉石濤：《西川滿小說集 1》，（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頁 129。昭和 14 年（1939），有日本大眾文學作家吉川英治連載於《臺灣日日新報》的《三國志》。這些都顯示中國說部傳統在

的出刊，趙雲石、趙雅福的「史遺」專欄，更延續了這個傳統，兼之同時期與《三六九小報》合作密切的「蘭記圖書部」，由上海的各大書局進口各類中國通俗小說進入臺灣，其中亦包含了不少晚清翻譯小說，所以殖民地臺灣，就這樣將中國傳統說部文化與啓蒙諷喻相結合，造就臺灣小說多元的面貌。⁴⁸所以，包括臺灣「大小人國記」譯者在內的臺灣知識份子，也因此能閱讀到林紓等人的翻譯小說，進而影響到己身對「大小人國記」的翻譯與閱讀。

這股表面寓翻譯而行諷喻之實的風氣，不僅在晚清的中國、臺灣發生，在日本，明治、大正年間的譯本，也指出《格理弗遊記》所具有的諷喻特點，明治年間的《鵲璫蟠兒回島記》在「作者生平介紹」中，稱此書為：「最受賞讚的戲作文以及寓言文。」⁴⁹又讚此書「針對羅馬教皇及清教徒作出諷刺。」⁵⁰以及評價作者的文辭：「沉著酸辣。」⁵¹明治 43 年的《ガリウアー小人國旅行》更直呼作者為：「英國第一流諷刺家的一大傑作。」⁵²大正十年的《グリバア旅行記》也以「諷刺」、「辛辣」等語辭，為讀者述此書的特點。⁵³可見譯者除注意到小說本身所帶來的滑稽作用外，對小說所隱含的諷喻意也有所體認，皆表現出對綏夫特氏著述此書的體會。⁵⁴

中國、日本的譯者對《格理弗遊記》的性質如此了解，日治臺灣〈小人國記〉和〈大人國記〉的譯者，也注意到《格理弗遊記》的諷喻性，〈小人國記〉的「緒

臺灣受到臺、日文人的喜好與重視。

⁴⁸ 林以衡整理日治時期「蘭記圖書部」的〈圖書目錄〉時發現，除了中國傳統演義小說大量地由上海進入到臺灣外，也有如林紓所譯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以及其他晚清翻譯小說如《拿破崙忠臣傳》、《希臘興亡記》、《驃騎父子》、《鐵匣頭顱》等各式翻譯小說，足見晚清的翻譯潮，是有影響到日治時期的譯者翻譯「大小人國記」。林以衡：〈蘭記書局出版與代銷圖書目錄〉，《嘉義蘭記書局史料論文集》（臺北：文訊雜誌社，2007），頁 270-271。

⁴⁹ 同註 31，頁 5。

⁵⁰ 同前註，頁 5-6。綏夫特氏為英國國教派的信徒，故對天主教的保守和新教徒的激進都不滿意。同註 3，頁 43。

⁵¹ 同註 31，頁 6。

⁵² 菅野德助、奈倉次郎譯：《ガリウアー小人國旅行》，頁 1。

⁵³ 平田禿木譯：《グリバア旅行記》，頁 14。

⁵⁴ 《鵲璫蟠兒回島記》以「戲作文」指稱「小人國記」，將其與當時日本流行的文學作品「戲作」予以結合，「戲作」之文，自江戶時期受到中國通俗小說的影響後，以其內容滑稽的特點，在明治時期受到民眾極大的歡迎，後因新聞連載小說以及活版印刷技術等的盛行而衰落。

言」就言：

古人有云：「吾人生於天地之間，有玩世者有厭世者。其在玩世之中，有以麴蘖自放，或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有不衫不履，視舉世若不當於意者，殊如小說著名批評家之金聖嘆，其怪行猶多，而馬遷有《滑稽傳》。滑稽如東方曼倩之遊戲金馬門尚矣。又有自標榜（姑與群小論一人之短長）是真玩世之極。願實際生活，若孜孜於群小爭論短長，勢必多受危險，寧託於筆墨婉曲道之，此鏡花緣小說所以多假藉也。」⁵⁵

譯者假托古人口吻，主要就是在告知閱讀者，寓諷喻於滑稽的文學題材乃是傳統文化中長久以來所保存的，但譯者又不願意落於「孜孜於群小爭論」中，故特別用此說明諷喻手法並不同於群小議論，最後，除肯定《鏡花緣》的假藉和諷喻之功外，也以此為例，指出為何要刊登綏夫特氏的小說供臺灣讀者閱讀。可見此篇譯者不但在中國文學上的修養深厚，也十分清楚《鏡花緣》與《格理弗遊記》得以相提並論。既然譯者清楚綏夫特氏的小說中以諷刺為主要特色，那身處於殖民語境下的譯者，又如何透過對〈小人國記〉、〈大人國記〉的翻譯，將綏夫特氏的諷喻手法，嫁接到日治時期的臺灣？

基於《格理弗遊記》本身具有的諷喻精神，日治臺灣〈小人國記〉或〈大人國記〉中，按此精神，有承襲原本、對整體人性進行批判和諷刺的部份，但也有某些情節，譯者在翻譯後將其改寫、更動，成為譯者有意對殖民統治發出異聲的工具。例如，屢次出現描述小說主角格理弗的排泄情節⁵⁶，不但是《格理弗遊記》異於其他小說的一個部份，也成為挑戰殖民權威的一個隱喻。閱讀兩篇小說，可知格理弗欲排泄之時，其前提條件是處在一個絕對緊張、壓迫的情境下。例如，〈小人國記〉中的排泄，是因為被送到統治中心的城裡，且身邊環繞小人國握有政治權力的達官顯貴，因而讓格理弗感到被壓迫，所以才會想以排泄來抒解壓力。同樣地，在〈大人國記〉中，縮小的格理弗遇到比自己大上好幾倍的老鼠，當生命危在旦夕時，心

⁵⁵ 〈小人國記・緒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5年（1930）3月3日。

⁵⁶ 〈大人國記〉中也言：「他了悟放心我便開步，走入一堆小草叢中，放開了褲，行一番金水及金塊解禁。」〈大人國記（11）〉，《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5年7月26日。

中的緊張和畏懼，構成他排泄的動因。以上不但是符合人類生理、心理的自然反應，經由排泄而釋放壓力的抒緩作用，除了是綏夫特對己身所處政治環境隱晦的心情寫照外，更可成為被殖民者藉由骯髒、汙穢的引寓得到喘息空間。〈小人國記〉中，就有一段描寫格理弗排泄時的文字，值得深思：

我於是就爬進去，將身後的大門關好。我直離開我的鏈子所能容我爬到地方才把我身上擔負的重載卸出去。但我這種舉動，若在普通國家的社會之間可要犯了大大的不潔行為，及違犯警察規章。然而以我現在所處境遇。恐怕人人都要憐憫，還肯據理責備了我麼？⁵⁷

這段文字的特殊之處在於，沒有其他的中文譯本，有出現「普通國家的社會之間可要犯了大大的不潔行為，及違犯警察規章」的語句或是意思，只要有譯出此段排泄情節的其他中文譯本，文字各不相同，但都顯得含蓄。⁵⁸日治臺灣的〈小人國記〉卻在此增添了兩個與國家權力有關的事務：衛生的重視與警察制度的控制。對於日治時期的臺灣而言，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所強力推行的，不正是衛生習慣的推廣、整潔環境的建構，以及嚴密的警察制度嗎？譯者透過此段格理弗排泄的不潔行為，實是藉由文學的翻譯與改寫後，利用文字的表達，刻意卻又不露骨地對殖民統治者作出抗議。而格理弗以排尿的方式，為小人國皇宮救火一事，雖然各中文譯本的差異不大，卻也是一個對統治者不滿的表達方式，皇宮代表的不僅是統治者辦公、居住的地方，更象徵著是一個國家、領地的權力中心，皇宮是神聖不可侵犯，更別說是以人體排泄物加以汙染，但對於臺灣譯者而言，此段文字並未因日本殖民者的控制而加以刪去，反而如實地將其譯出，即代表譯者藉由此段文字的翻譯，實質上是

⁵⁷ 〈小人國記（9）〉，《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5年1月13日。

⁵⁸ 例如林紓的《海外軒渠錄》將此段譯為「讀吾書爾，當諒余至此，不能不作獸臥境，逼我也。自是日起，遂晨起吸天氣，即鍊條所及地之間，閒行自適，而遲明供禦之物，即紛沓而至。」同註21，頁10-11。《汗漫遊》則譯為：「我玩賞了一回，覺得幾天沒出恭，肚子狠痛，我便俯身入門，把門關上，走到裏邊，解了小衣，就在地板上出了恭，肚子頓然舒服，但是那臭氣觸鼻，令人難受……看官，你們替我想我處這般境地，到底是苦不苦呢？」同註21，李伯元，頁329。所以「排泄情節」也可見不同語境、時代下，日治臺灣獨特的譯意。單德興則認為，原著本此處再次有違文學成規，但採取含蓄、迂迴的表達手法……以期在貌似寫實的同時，不致過於干犯社會禮儀。同註3，頁42。

期盼此情節能在現實中發生，但這種對殖民統治權威褻瀆的意念，自然不能直接表明出來，於是，透過對〈小人國記〉的譯寫，譯者利用原著本身所建構的汙穢情節，暗地挑戰日本殖民者平日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使得這段看似忠於原著的翻譯，就在譯者承接原作者「刻意違反文學成規」的用意下⁵⁹，造成排泄情節在殖民語境中更顯突兀，達到抒發對時政不滿的效果，卻又能因為作品為翻譯作品的關係，避免殖民官方的檢查，達到譯者名哲保身、寄寓諷諫的目的。

對日治臺灣的〈小人國記〉和〈大人國記〉而言，譯者非但沒有如日本的譯本般將「格理弗」排泄的情節省略，反而是使用比林紓等中文譯本更為鉅細靡遺地描述方式，將其安排於情節中，這種藉翻譯小說以骯髒、隨意對抗殖民統治整齊、嚴肅的意圖十分明顯。原著這種透過汙穢行為達成對當權者反抗的手法，單德興指出源於拉伯雷的幽默手法⁶⁰，是《格理弗遊記》相當奇特的書寫策略。⁶¹的確，透過對「肉體低下部位」的展示，與其排泄功用性的「卑賤化」描寫，「髒物」和「汙穢」將會是狂歡節廣場的話語在挑戰國家權力時的重要形象。⁶²譯者將作者「寓排泄於詼諧」的用語帶入殖民臺灣的語境中，成功地藉由翻譯行為挑戰了殖民政府的權威性。

而〈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中對總體人性的批判和諷刺，也成為譯者嘲諷日本意圖向外展開侵略戰爭的工具，〈小人國記〉中，主角「格理弗」協助小人國把敵國的船隻拖過來後，小人國王顯露出貪得無厭的野心，讓「格理弗」對專制政治感到厭憎，以及感慨人性無限度的貪婪，日治時期的〈小人國記〉將此段譯為：

凡屬君王野心，大概都是一樣，總想著全世界的勢力，都集到他一個人身上，

⁵⁹ 單德興指出：「古今中外的文學傳統，為了文雅之故，絕少描寫這種場景。本書則有不少有關排泄及其他『噁心』的描述，一則在奇幻中保持寫實（或者說，藉著有關人體生理的寫實，以示此奇幻之作並非幻想），再則挑戰固有的文學成規（literary conventions）和社會禮儀。」同註 3，頁 36。

⁶⁰ 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作家，其《巨人傳》一書，內容以荒誕不經為主，並以嘻笑的方式對教會、政治進行諷刺。拉伯雷著，成鈺亨譯：《巨人傳》（臺北：桂冠圖書，2005）。故巴赫汀對其小說中所充斥的廣場語言最有興趣，因而著有《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一書。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2版），頁 262。

⁶¹ 同註 3，頁 36。

⁶² 同註 60，頁 284-290。

其餘的人，都得聽候他的命令。總要顯著別人都在弱小之列，惟獨他一個人，是最強最大……強迫那些民族，服從他的宗旨……好像他才算是世界唯一的君主。這樣侵略主義，我努力使他改變，我使用了許多政策上的正義上約理論勸他。⁶³

此段文字有幾處與其他譯本不同的地方，值得深思，例如日治臺灣的版本中出現如「強迫那些民族，服從他的宗旨……好像他才算是世界唯一的君主」和出現「侵略主義」的用語，都較其他中文譯本來得強烈⁶⁴，也符合當時戰火即將燃起的時代背景。身在臺灣的譯者，已經感受到因為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而整個東亞即將陷入戰火的危機中。在譯文中，譯者不吝惜地由〈小人國記〉的譯寫，指明日本殖民政府欲以武力征服東亞民族的野心。強烈的「侵略主義」用語，更直接指陳日本軍部向外擴張的計畫。當然，由小說可知，譯者對於戰爭和侵略並不支持，但卻又不能公開高談反戰的論調，於是藉由〈小人國記〉的政治隱寓，在戰雲密佈的此時，暗喻自身對於時下戰事一觸即發的不滿。

藉由〈小人國記〉的譯寫，譯者以不同其他中文譯本的翻譯手法，表達對戰爭的厭惡，以及痛斥侵略主義起於專制政體的貪婪外，譯者也在譯寫的行為中，對時下殖民政府提倡的口號、用語，進行諧謔的使用，〈大人國記〉中主角「格理弗」變成大人的玩物，原本主宰一切的萬物之靈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苦嚙被迫表演取悅大眾後，在身心方面的辛勞：

這一天計給十二起人看，勉強照法敷衍，身體疲倦欲死，姑娘憐我，代告訴父親。把旅館門閉起給我休息。我的主人，為了維護利益。恐我被人傷害，不容觀客手觸及我，這說世界共存共榮的大情理觀客非無一二，欲探手摸我，奈去桌太遠，固摸不著。⁶⁵

⁶³ 〈小人國記（32）〉，《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5年4月23日。

⁶⁴ 例如今本由單德興所譯的《格理弗遊記》，以較為符合原著的語句「強迫人民由小端敲蛋，這樣他就可以成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君主。」來翻譯此段語句，但並不含與「侵略主義」相關的用語。林紓的《海外渠天錄》、《繡像小說》的《汗漫遊》則僅以「凡帝王之貪功，往往如是。」同註21，頁32、「我聽了這話，暗暗想道，這箇國王真正貪得無厭。」同註21，李伯元主編，頁349。皆表達此段情節。

⁶⁵ 〈大人國記（15）〉，《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5年8月4日。

昭和 15 年（1940），日本因應戰爭需要而以「大東亞共榮圈」作為國家施政方針，且逐漸變成日本向外擴張的思想與口號。本來是建立國家精神和體制的嚴肅標語，在這裡卻被譯者巧妙地用來指涉觀客的好奇心普世皆同，也是個「共榮共存」的現象。「共榮共存」的標語，瞬時成為日治臺灣〈大人國記〉的獨特用語⁶⁶，譯者試圖寓小說中降低此話語的政治意義，卻也將此話語放置在〈大人國記〉內，使其配合主角被當成玩物的情節，成功地將國家權力下的制式標語，化約為使讀者會心一笑，並充滿言語戲謔的譯寫工具，連同上述的「侵略主義」，皆成為譯者模仿殖民政府政治手段的「戲擬」之語。⁶⁷

最後，日治臺灣的〈小人國記〉、〈大人國記〉，在昭和年間日語已經在臺灣廣為使用的環境下，譯者仍選擇將其譯為漢文、並刊登在《臺灣日日新報》有限的漢文版面上，此一動機本身就帶有與致力推廣日語的殖民政府相抗衡的用意，且藉由〈小人國記〉中使用語言的看法，達成內外呼應的效用。在主角「格理弗」幫助小人國將敵國打敗後，小人國的國王轉而強逼戰敗的一方必須使用「里里浦語」，「格理弗」對此有感而發地說：

還有一事要說明白，那些大使，是用一個翻譯向我說話，那兩國言語不同的程度，就如同歐洲兩國一樣，不論那國都要自誇自己的語言如何典雅、如何適宜，怎麼好聽怎麼佔勢力，居然看不起鄰國的語言。⁶⁸

由〈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的譯者「自序」中，可知譯者對於漢文化的傳統，實有深厚的認識，「自序」不但是以典雅的文言文述其譯旨，兩篇小說經翻譯後書寫的文句，亦相當流暢。譯者雖自謙刊載此篇小說的動機，並非是：「本報茲介紹英人斯偉夫特氏之小人國遊記，彼其用意，果欲與群小爭短長耶？」⁶⁹但能領

⁶⁶ 本文比對其他四個中譯本，皆未有此相近語詞。

⁶⁷ 劉康分析巴赫汀的理論，認為「戲擬」就是「是一種模擬或模仿，……乃是語言對語言的模擬，它又包含了不甚恭維、不太嚴肅的成分，有開玩笑、戲謔、逗哏、調侃的性質。不過，調侃的背後又有著非常嚴肅深刻的意蘊。」同註 60，頁 230。

⁶⁸ 〈小人國記（34）〉，《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昭和 5 年 4 月 25 日。此段強迫使用語言的情節，單氏譯本、林紓譯本皆有譯出。

⁶⁹ 〈小人國記・緒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 4 版，昭和 5 年 3 月 3 日。

悟到小說的諷喻用意，並以文言文和白話文交相運用的語言手法觀察，譯者必是一位嫺熟漢文的文人，且對於日漸衰微的漢文感到悲憤的文化維護者。再者，譯者透過使用漢文對小說的譯寫，才能將其寓於小說中對時政的諷寓企圖，完整地傳達給仍必須以漢文作為主要閱讀工具的知識份子們。所以，無論小說中的諷刺性情節在殖民語境下如何被譯者鋪述，若非以通篇以漢文譯寫，小說的諷寓性也無法清楚彰顯，或與熟悉漢文的讀者們互相產生對漢文「心有戚戚焉」的共感。就在此考量下，這兩篇小說譯介進入到臺灣，不但是將西方文學名著嫁接到殖民臺灣的文化接受，也是在不違背與傳統文化的連續、殖民法律的限制下，讓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與世界接軌，其清楚的譯寫方式和用意深遠的諷喻意圖，將在殖民地語境下彌足珍貴。並為《格理弗遊記》的中譯歷史，增添重要的一頁。

五、「大小人國記」中譯者與讀者的政治想像

《格理弗遊記》中，主角格理弗的冒險，是在奇遇下進入到各個非屬常人世界的奇幻國家，而後展開歷險的故事。由於作者綏夫特對於英國政治現況的不滿，造就《格理弗遊記》寓於情節中的濃厚諷寓性，透過以「國家」作為小說單元的組成，更能將作者對時政的不滿，藉由書寫國家制度表現出來。既是如此，在譯者深知《格理弗遊記》的諷寓特性下，譯者也在譯寫「大小人國記」的過程中，藉由格理弗的描述，體認到現實生活中英國的各項制度，或是感受到大小人國虛幻、異於常人世界的治國方式。現實生活中的國家形象，為日治臺灣「大小人國記」的閱讀者開啓一扇知識窗口，而幻想中的國家制度，則對照現實世界的國家形象，襯托出更為強烈的國家意義。無論實或虛，都讓臺灣閱讀者感受到一個異於總督府統治下的政治制度，於是譯者就藉由對「大小人國記」的譯寫，成功地傳達原著作者綏夫特對國家、人性的不同思考，幫助自己和臺灣閱讀者深刻地去認識、比較一個與殖民地臺灣不同的政治局面，藉由小說的譯介擴展自己的政治想像，並對己身作出反思。

日治時期臺灣對於西方國家的認識，早在明治年間就已開始，但此時期的臺灣文人在以西方國家為例書寫小說時，大半僅能以粗淺的地理知識和抽象、模糊的國家概念，將其轉化為小說背景，黃美娥分析這些小說後即指出：

不管是以國家或城市、地方為小說場景的作品，作者對於各國風光之掌握並不一致，部份作者無法具體而真實地呈現相應的地景、地貌，其所敘述之文學場景無法顯現國際地理、地貌、地景的差異性，而單純只以國名或地名標誌出故事場景的邊界所在。⁷⁰

雖然日治初期臺灣小說對西方國家形象如此模糊，但到了昭和年間，隨著〈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被譯介進入臺灣，綏夫特對於其國家英國詳細地描繪，為讀者建構出較為完整的西方國家形象，透過這個國家形象的建立、現實與虛幻的交錯，譯者藉由翻譯的行為，以西方國家為例，與臺灣閱讀者一同認識原著者筆下的英國的政治制度。

對於全世界閱讀過《格理弗遊記》的人而言，〈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帶給讀者的，除了滿足人類長久以來對於「小人」和「大人」的好奇心外，作者綏夫特將西方政治、文化融入小說中加以描述或諷刺的手法，讓非歐洲世界的人們，產生對歐洲世界好奇。如何擅用臺灣人對西方世界的好奇心態，不再讓此好奇心停留在器物層面的模擬，進而讓小說閱讀者對西方有更全面性的了解，翻譯小說就肩負著啓迪民智的重任。〈小人國記〉、〈大人國記〉的譯者在將這兩篇小說引入臺灣時，發現了翻譯小說的此項功用，於是在「緒言」中特別言此小說：「惟其設想，離奇怪誕，又能不背於理有足多者。」⁷¹並說：

當今交通大啓環地面國者，皆近若比鄰，南北極、非洲、西藏，乃至深、絕海。行將闡發無遺。⁷²

譯者一方面知道〈小人國記〉以「離奇怪誕」為表面特點，又肯定它「不背理」的寫作手法，認為它是一部有深度的文學作品。但下文的描述文字中，譯者雖與閱讀

⁷⁰ 同註 1，頁 6。

⁷¹ 同註 55，〈小人國記・緒言〉。

⁷² 同註 55，〈小人國記・緒言〉。

者一同分享他的世界觀，卻未提及原著作者、小說主角所身處的歐洲，也未提及美洲等地。反而是談到人跡罕至的南北極，或是同在亞洲的西藏。身為翻譯小說的負責人，譯者或是時下的臺灣人，必定知道歐洲的存在，但刻意於此省略不提，表現出譯者不願在閱讀者閱讀小說之前，就先把相對於臺灣處於西方的歐洲說出，以期能讓讀者有更多的思考空間，隨著小說情節的發展，一步步去建構讀者心目中的西方世界。

相對於西方歐洲的真實存在，小說主角格理弗所漂流到的小人國與大人國畢竟不是歐洲，而是作者自我想像中的空間。且兩國的國王和人民，也都被安排不知道歐洲的存在，所以描述歐洲的文字，表面上是對二國的國王而言的內容，卻透過格理弗之口，將英國實在的政治制度與地理空間傳達給讀者知曉，讓臺灣閱讀者藉由譯寫的描述，勾勒出一個比日治初期更為具體的「英國」：

我開始用我的談話，先告知皇上，我的領土，包括兩個島，兩個組成三個大王國，一個君主之下，除開在美洲的我殖民不算我說了好久。我的土地肥沃，我國氣候溫和。⁷³

又對大人國國王言：

英國議院的組織，一部是顯貴的團體組的，叫作貴族院。都是最貴族的人。有最古最大的遺產的人。議院的別一部份，包括一個叫作眾議院的議會，其中都是主要的紳士歸人民自己自由挑選出來的，為著他大本領與愛國心。代表全國的智慧。這兩個團體組，成歐洲的最尊嚴的議會，全部的立法事情，都付託給他的會議同君主辦理。⁷⁴

透過對英國議會制度實在的描寫、闡述與翻譯，可與臺灣的政治制度作一對比。大正10年（1921），日本殖民政府在輿論的壓力，以及治臺方針的改變下，頒佈「臺灣評議會」作為殖民地臺灣的議會機構，但這個「臺灣評議會」不但是要「受臺灣總督之監督，應其諮詢，開陳意見。」⁷⁵且其組成成員，幾乎是與日本政府較為親

⁷³ 〈大人國記（46）〉，《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5年10月4日。

⁷⁴ 同前註。

⁷⁵ 黃靜嘉：《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及其影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

近的士紳如辜顯榮、李延禧、簡阿牛、顏雲年等臺灣士紳富豪所組成，這個僅有象徵意義而沒有實際權力的議會機構，並非臺灣人在經歷「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後的願望實現，反而變成臺灣總督府安撫人心和更加合理其殖民地統治的結果。對照小說中格理弗自豪的英國議會制度，譯者藉由翻譯的動作，與兩方議會組成成員性質相似的特點，實是作出對臺灣政治制度的反諷，因為英國的議會政治，至少可由「人民自己自由挑選出來」，且「全部的立法事情，都付託給他的會議同君主辦理。」反觀臺灣的議會制度，卻只是臺灣總督府的一個橡皮圖章，其權力還是握在臺灣總督個人手上。透過格理弗之言道出的政治國家，其人爲所制定的規章與制度，對照臺灣現實政治的情況，讓閱讀者在閱讀中不自主地進行比較和質疑。臺灣閱讀者於是透過這些政治、歷史與文化上的議題，除建構一個對西方國家實質性的認識外，也透過對所處現實政治的對照，開始檢討己身所處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與合宜性。還有，當〈大人國記〉的大人國國王再度詢問格理弗「自由黨」與「保守黨」的兩黨政治問題⁷⁶，讓讀者與小人國的專制政體並置思考，對於日治時期處於專制統治下的臺灣人來說，通過小說認識英國的兩黨政治，將會讓臺灣閱讀者知曉，在這世界上的政治體制，並非只有日本天皇或是日本總督府的存在。於是譯者藉由國家典章制度的制定、或是法律觀念的培養⁷⁷，啓蒙出一個讓臺灣翻譯者和閱讀者和以往不同、更爲真實且足以拿來爲自身所處環境相比較的政治想像。

格理弗對英國政治制度的介紹，讓臺灣閱讀者在日治初期所接受到的、臺灣文人在小說中所建構出以科學掛帥的西方想像不但不同，也因為轉以對政治議題進行更深度的思考，進一步由政治想像擴展臺灣閱讀者對世界、人性等的認識。其中，在批判政治下對人性進行的辛辣批判，讓臺灣閱讀者有耳目一新之感。例如〈大人國記〉的大人國王請格理弗談論其國家時，大人國王對英國的負面印象，讓格理弗極爲難受：

他這樣說著，我的臉一紅一白好幾次，帶著憤怒的聽。著我的高貴國家之工

頁 99。

⁷⁶ 〈大人國記（23）〉，《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5年8月19日。

⁷⁷ 〈大人國記（47）〉，《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5年10月5日。

藝、軍器、女皇。法蘭西的皮鞭、歐洲的正人德性、憐憫、榮譽和真理之家，世界之□□與妒羨。遭如此侮辱的談論，但是因為我不是在一種對於損害的表示怨恨的情況中，所以熟思之後，我是不受損害，因為在這幾個月，及這般人談慣了。⁷⁸

原著者綏夫特氏將自己對歐洲政局或是人性的不滿，融於小說中，特別喜愛針對歐洲的政壇以及外交問題，作出對比性的批評，〈大人國記〉被翻譯進入臺灣後，臺灣閱讀者經由小說所見到的歐洲，雖有完備的政治制度，卻有更多人性脆弱的一面，甚至不堪到原本得意為歐洲制度、法制宣傳的格理弗本人都覺慚愧，本來自豪之事，卻在此變成自慚之感。當大人國國王再次召喚格理弗前來談論歐洲時，一個負面的歐洲形象，再度呈現在臺灣閱讀者前：

一日，皇上更召我說上一記的歐洲歷史，我滔滔說了約兩個鐘頭，皇上皺著眉頭，只給我數句惡評。皇上說著，汝等小人輩住的地方，並沒有光榮的歷史，只是一意謀害、反叛、虐殺、屠戮、革命、徒流。均為貪婪、軋轢、假冒、無信、殘忍、忿怒、瘋狂、仇恨、忌妒、惡意或野心所能產生這樣最壞的結果。⁷⁹

大人國的皇帝又說：

但是就我從你自己的述說中所集的話我費力酌從你嘴裡掐出來的回答來看，我不得不斷論你國的人。大半都是小小可惡的害蟲之最惡的種族。⁸⁰

綏夫特對於人性的檢討雖然嚴厲，但譯者將這些部份譯寫進入臺灣後，臺灣閱讀者對於人性的思考，將不再只是單純地善／惡傳統的二元對立。同樣身為人類，透過大人國皇帝所作出的批判，臺灣閱讀者自然不能忽略此部份自我檢討的情節。如果說，日治初期的通俗小說中引進西方器物、科學或是破除迷信的理性精神，能被視作現代性的移植，那麼，〈小人國記〉、〈大人國記〉中所不停展現對政治局勢的思考，或是人類群體的自省功能，則幫助臺灣閱讀者在面臨一連串現代化革新，

⁷⁸ 同前註。

⁷⁹ 〈大人國記（53）〉，《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5年10月16日。

⁸⁰ 〈大人國記（54）〉，《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昭和5年10月17日。

以及現代性精神的衝擊後，能夠經由與歐洲想像的相對照，拓展自己對西方在現代化後，可能會有何種優缺問題的省思，這將是對全球共有的人類普世價值進行檢討。也是日治臺灣社會在歷經長時間現代性的洗禮後，所能獲致的最大成就。

總而言之，〈小人國記〉或〈大人國記〉雖然通篇充滿奇幻色彩，卻又在寓含諷喻的寫作意圖下，藉由對歐洲政治制度的介紹，展現出譯者與讀者共同的政治想像，並擴及到對全體人性的省思，使得同樣身為「人」的臺灣讀者，在閱讀〈小人國記〉、〈大人國記〉時，無法迴避對自我的檢討，卻也因此將臺灣與西方世界的距離更加拉近。臺灣讀者對西方世界不再僅限於器物、技術方面的想像，更能因為類似〈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般的諷喻類文學被譯寫進入臺灣，而對於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有更深層的認識，並進行與臺灣現實政治情況的比較。臺灣民眾不會如同小人國國君或大人國國君般，不知世界之大，也不會因此成為對世界潮流一概不知的井底之蛙。

六、結論

本文透過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上所刊載的兩篇小說〈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為思考對象，除介紹日治時期臺灣民眾對於「小人」、「大人」的好奇心外，由報上所刊載「小人」與「大人」的表演介紹，亦可知時下之人對於定義「小人」與「大人」的大致標準。在這些表演消息的推波助瀾下，當《格理弗遊記》中的〈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被譯寫進入臺灣連載後，很容易就受到臺灣閱讀者的喜好與閱讀。但此二篇小說既然經由翻譯的過程進入臺灣，臺灣譯者譯寫時所依據的來源，就值得本文由重重文化影響層面中加以梳理，經由本文以中譯本和日譯本的比較後，發現日治時期的這兩篇小說，直接由外國原著譯入臺灣的可能性較大，由此可見日治臺灣對於外國著作的翻譯，並非一定要經由中文或是日文的二度翻譯，才能進入臺灣，表現出臺灣翻譯程度的提升，以及對外界知識接收的能力極高，

日治臺灣的版本，也在《格理弗遊記》的中譯史中，佔有承先啓後的連接地位。而由於《格理弗遊記》本身為諷喻性極強的文學作品，故譯者在譯寫〈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時，巧妙地將對殖民政府的諷刺，寄寓於小說情節中，由於小說所處的政治、文化語境不同，在不違背原著寫作精神的前提下，譯者得以讓臺灣閱讀者閱讀到幾近完備的小說，卻又能在兼顧漢文學傳統的脈絡中，將小說的諷喻之意發揮的淋漓盡致，不但可見譯者學兼中西，也讓時下臺灣對於諷喻文學有更為深刻的體認。最後，小說為臺灣閱讀者所傳達的，不僅是對西方國家政治制度的想像，更能經由對總體人性的反省與思考，深化臺灣閱讀者的知識層面，〈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所帶給臺灣閱讀者的，不單只是器物、制度上的認識，也是更為裡層的是非判斷與理想建構，〈小人國記〉與〈大人國記〉在日治臺灣翻譯文學中的地位，因此更為重要，而未來如何能將日治時期翻譯文學的問題更為擴大思考，將更能加強臺灣文學與世界的對話與交流，實為臺灣文學研究值得重視的問題面向。

引用書目

（一）中文資料

- 《臺灣日日新報》，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微卷。
- 《臺灣民報》，臺北：東方文化復刻本，1974。
- 晉·張華：《博物志》，臺北：藝文印書館，1958。
- 清·李汝珍：《鏡花緣》，臺北：聯經出版社，1997。
- 清·蒲松齡著：《聊齋誌異》，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3。
- 《羅賓漢》，The adventures of Robin Hood，臺北：九儀，1998。
- 李伯元主編：《繡像小說，第3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 林紓、魏易譯：《海外軒渠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
- 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
- 袁珂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1。
- 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單德興：〈格理弗中土遊記——淺談《格理弗》最早的三個中譯本〉，彭鏡禧主編：

- 《解讀西洋經典：小說、思想、人生》，臺北：聯經出版社，2002。
- 單德興：〈翻譯・經典・文學——以 Gulliver's Travels 為例〉，馮品佳主編：《通識人文十一講》（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 9 月），頁 79-112。
- 單德興：〈譯者的角色〉，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主編：《國科會外文學門 86-90 年度研究成果論文集》（臺中：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2005），頁 1-28。
- 單德興譯注：《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
- 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漢學研究》28:2（2010），頁 363-396。
- 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通俗小說中的文化地景、敘事倫理與知識想像〉，《臺灣文學研究集刊》5（2009），頁 1-39。
-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
- 黃靜嘉：《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及其影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
- 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
- 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2 版。
- 潘少瑜：《清末民初翻譯言情小說研究——以林紓與周瘦鵲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二）日文資料

- 九歧晰：《小人世界》，出版地不詳，明治 20 年（1887）8 月。
- 片山平三郎口譯、九歧晰筆記：《繪本鵲璣蟠兒回島記》，東京：薔薇樓藏梓，明治 13 年（1880）3 月 23 日。
- 平田禿木譯：《ガリバ旅行記》，東京：富山房，大正 10 年（1921）。
- 仲側紅果譯：《ガリバ旅行記》，大阪：日本出版社，大正 13 年（1924）。
- 松元至文、小林梧桐譯：《ガリバ旅行記》，東京：昭倫社，明治 42 年 1 月（1909）。
- 菅野德助、奈倉次郎譯：《ガリウアー小人國旅行》，東京：三省堂，明治 43 年（1910）。